

市场化机制能否缓解产能过剩

——基于企业治理视角

何小钢¹ 陈锦玲¹ 罗奇² 王自力¹

(1.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2.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市场化改革是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从企业治理这一市场化机制视角探索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研究发现: 良好的企业治理架构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 提升企业投资和决策效率, 进而通过减少投资失误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缓解产能过剩。进一步地, 利用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 120 个地级市共 11 211 家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企业治理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验证其理论机制。实证研究发现: (1) 分权、薪酬激励及管理层更替等市场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提升产能利用率, 这一结论在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和排除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稳健; (2) 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主要通过促进市场扩张和增加创新两个途径实现; (3) 在非国有企业、政企关系较弱的企业以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中, 企业治理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更突出。研究表明, 通过市场化机制, 即强化企业治理, 可有效缓解产能过剩。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 市场化机制; 企业治理; 产能利用率; 分权决策; 高质量增长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21)05-0026-14

DOI:10.13269/j.cnki.ier.2021.05.003

一、引言

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 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之一。产能过剩导致经济波动加剧、资源浪费严重以及环境污染恶化等问题, 成功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治理产能过剩, 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但是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产能过剩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抑制, 反而陷入了“过剩—调控—再过剩—再调控”的怪圈^[1-3]。产能过剩问题久治未决, 亟须寻求新的治理视角。

以往的治理措施都是基于产能过剩的成因提出的。对于产能过剩的成因, 现有文献虽然远未达成共识, 但是主要集中在政府管制、地方政府竞争扭曲、国企软预算约束等宏观视角。首先, 研究者发现, 政府对行业产能的管制政策是导致产能波动与产能过剩的重要诱因^[4-5]; 其次, 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导致的预算软约束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关键原因^[6-7]; 最后, 多数研究者认为, 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市场分割以及补贴和要素扭曲等干预了企业生产行为, 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8-9]。这些

收稿日期: 2021-06-11; 修回日期: 2021-08-15

作者简介: 何小钢(1978—), 男, 江西新干人, 经济学博士,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企业成长; 陈锦玲(1997—), 女, 江西景德镇人,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 罗奇(1996—), 男, 江西高安人, 通讯作者,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 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 王自力(1971—), 男, 江西吉安人, 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政府规制与产业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630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1630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1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BTJ018)

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突出了政府(及其官员)行为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为理解中国式产能过剩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洞见。基于政府视角给出的产能过剩治理政策也曾在中国过去多轮产能过剩治理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由于忽视市场化机制对产能过剩治理的重要性,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经常陷入“管制—过剩”循环的怪圈。事实上,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极易扰乱市场优胜劣汰的正常运行,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多年产能过剩治理的经验事实证明,政府调控政策要与市场机制匹配才能发挥更大功效。现有文献在主张政府调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政府与市场互动、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互动^[1-3]。市场化改革措施被证明能有效缓解产能过剩,因此,应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化解过剩产能。虽然现有文献已经充分认识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具体采取何种市场化治理方案却鲜有研究。为补充和拓展现有治理政策,本文从企业治理的视角探索中国产能过剩治理的市场化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10]。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还需从导致产能过剩的企业出发。

良好的企业治理架构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投资和决策效率,进而通过减少投资失误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缓解产能过剩。虽然有不少文献关注到分权、激励及监管等市场化治理模式对组织决策和管理效率的积极影响^[11-12],但尚未发现有文献研究企业治理能否缓解产能过剩。本文基于企业治理视角,研究分权、薪酬激励及管理层更替等治理架构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探索企业治理化解产能过剩的微观机制。进一步地,本文采用2003年和2005年世界银行调查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厘清企业治理架构化解产能过剩的具体效应与异质性微观机理。研究发现:分权决策、薪酬激励以及管理层更替等治理模式有利于企业提升产能利用率,且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主要通过促进市场扩张和增加创新两个渠道实现。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虽然现有研究已经注意到市场化机制以及企业行为对产能过剩治理的重要作用,但是缺乏直接从企业层面研究产能过剩的文献。本文将企业治理与产能利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企业治理提升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机制,补充和丰富了现有文献。(2)与现有文献从政府管制、地方政府竞争扭曲等政府干预角度进行研究不同,本文从市场化机制的视角探索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这一视角更加符合当前中央倡导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宏观背景和改革取向。同时,与以往的宏观视角不同,本文从企业治理这一微观视角出发,分析如何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和治理范式以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水平,从微观层面为化解产能过剩提供了新的方向。(3)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表明,通过引入市场化手段促进企业治理模式优化和迭代,能有效帮助企业去产能、提绩效,这从供给侧为化解产能过剩“痼疾”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后续结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与经验假说;第三部分对数据来源、模型设定以及变量定义进行了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在基准结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扩展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述评与经验假说

本文主要从企业治理的角度考察企业内部组织决策权的分配、薪酬绩效激励和管理层更替风险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第一类主要探讨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方式;第二类主要聚焦于企业治理机制与投资行为、绩效研究。

(一) 产能过剩的成因及治理

产能过剩成因及治理的有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政府管制、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对产能过剩产生的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的政治晋升博弈,严重紧缩了地方官员的合作空间,加剧了各地官员间的竞争程度。不同地区间争夺发展资源、恶性竞争的行为导致了产能过剩^[8]。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和价格管制措施,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信号,引发了低效率的资源配置,进而造

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13]。另外,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产权缺陷及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因此国有企业占比较大的行业更容易出现不计成本的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行为^[6]。

除了考虑政府不当干预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不少研究还关注到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动关系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而引发产能过剩。干春晖等^[7]发现,地方政府官员迫于晋升压力为当地企业提供土地、融资等优惠政策,会降低企业获取资源的成本,促使其产生产能扩张的冲动。而且,地方政府补贴倾向于大企业、核心企业,会刺激企业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现象加剧^[9]。张龙鹏和蒋为^[14]发现,政企关系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重要手段,较好的政企关系会提升产能利用率,而不恰当的政府干预会加剧行业产能过剩。此外,有学者关注到产能过剩可能独立于行业外部条件或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与个体理性投资有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容易对某些行业发展产生共识,从而出现行业投资聚集的“潮涌现象”^[15]。

在产能过剩的治理上,现有文献除了集中讨论各种政府管制政策之外,已经开始关注市场化机制以及企业的重要性。吴利学和刘诚^[3]发现,处于“不完全的市场化状态”的地区和行业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虽然短期来看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够缓解产能过剩,但是长期来看产能过剩治理还需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调整官员晋升机制^[5],应通过构建市场化发展模式和监管体系,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来化解过剩产能^[4]。白让让^[16]则指出,“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政府不应过度干预企业和市场运行,应当厘清与企业的边界,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政府应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以淘汰产能利用率低下的企业,提高整体的产能利用水平^[2]。

(二) 企业治理、投资行为与绩效

企业内部治理模式对组织生产、决策及管理效率有着重要影响。根据集权理论,权力的集中可以保证决策一致并且统筹协调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17-18]。反之,分权意味着企业各部门都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决策权的下放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避免执行决策的延误,提高投资决策效率^[19]。一方面,市场波动和预期偏差的存在,要求企业决策者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外部市场竞争情况及内部生产经营状况等相关信息。一般来说,信息和沟通成本较低的企业,各类信息收集、处理和传播的速度较快,能够有效减少计划和实施时间,从而产生较大收益^[20]。另一方面,管理者作为企业决策者,在市场预测和成本控制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由于认知水平有限,下级职能部门获取的信息往往比上级部门更为准确。就决策和管理效率而言,分权更有利于信息和决策的统一,能够有效避免执行决策的延误,有效提高组织效率。此外,在现代企业治理中,以企业经理为代表的实际管理者在投资决策时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加之企业内部监管不到位和不完全契约问题,易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和决策上的次优选择^[21]。

已有研究还发现,管理层激励对管理者的工作效率与决策行为有直接影响,合理的激励措施能抑制管理层自利行为。企业绩效激励越强,管理者将越注重企业经营和决策的合理性,继而避免过度投资行为^[22]。此外,一些有效的管理措施,如薪酬计划、利润共享、监管惩罚等,对公司绩效有重要影响^[23]。Guadalupe and Wulf^[24]发现,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美国企业高管的职位数量减少,组织结构愈发扁平化。一些研究还发现,管理层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年龄等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25],董事会与股东能够抑制企业过度投资^[11]。而且适当的分权和激励机制的引入能够激发员工积极性与自主性,鼓励其更多地参与到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过程中,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26]。

综上所述,企业治理能力的提高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优化组织的投资决策和生产管理过程,适当的分权、激励以及强化对管理层的监管能够改善企业投资与决策效率。虽然不少文献关注到分权、激励和管理层监管等治理模式对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积极影响,但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其能否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

(三) 微观机制与经验假说

产能过剩的本质在于“事前”预判的生产能力与“事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27]。一方面是企业产出大幅度低于正常限度的产出水平,造成产能闲置,资源利用率低下^[28]。另一方面是企业提供的生产、服务超过市场均衡时的产品需求,出现过度投资行为,导致产品供过于求,企业亏损增加,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闲置^[29-30]。企业的投产阶段和生产阶段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投产阶段提前预测市场需求并确定投入的设备、主要材料等产能水平;生产阶段则是在固定的产能约束下根据新一期市场需求进行实际生产。因此,保证生产决策与市场需求一致对抑制产能过剩相当重要,分权、管理层激励等企业治理架构是保证企业预期产能和实际产出一致的关键。采用分权决策的企业以及管理层激励较强的企业可以更多更好地接触到市场信息,获取并匹配生产与需求信息,有效降低由投资失误和生产与需求不匹配造成的产能过剩。

产能利用率反映了企业的组织效率和创新的执行力,而决策权适当下放有利于降低信息交易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决策效率^[31]。另外,分权、管理层更替等治理模式还增加了企业研发支出,这对提高产能利用率也有正向作用^[32]。此外,企业内部治理的完善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通过实施薪酬激励机制和强化管理层监督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参与度,减少监督管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和资源使用效率。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通过完善企业治理能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分权、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更替等治理机制的引入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有积极影响。

1. 市场扩张与产能利用率

企业“资源基础”观认为管理能力是决定企业规模的关键因素^[33]。管理层给予部门经理一些决策权,就能将其注意力聚焦于企业规模扩大这类更重要的经营管理决策,从而提高管理层的决策效率,扩大其管理范围。Chandler^[34]研究美国大型企业的增长情况时发现,这类公司主要是通过建立“本地现场单位”、地区工厂或销售网点,从总部分散权力而创建的。在远距离异地经营中,因为沟通的限制,首席执行官无法指导远距离外管理者的运作。如果没有权力下放,这些公司将无法高效管理和扩大生产。因此,权力下放是必要的,分权是企业规模扩大和跨省异地经营的关键决定因素。此外,在薪酬绩效契约下,高管的报酬将根据公司的经营绩效来决定,自利的管理者将通过提高公司经营绩效来提高自己的报酬。因此,采用薪酬激励计划或更换绩效不佳的管理者对企业绩效提升均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和市场扩张。这种市场扩张对产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规模经济和贸易销售渠道的扩张能够直接增加产品的外部需求,企业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渠道来源更多,这为企业协调供需、淘汰落后产能、创新生产与销售模式等方面提供了更多帮助。相比于小企业,大企业能够分散风险,应对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波动的能力更强。

其二,跨地区经营使企业能利用更大地域范围内的禀赋资源,拥有更大规模的潜在客户,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产品流通和产能消化,提升产能利用水平。而且企业通过优化管理和决策模式引致的跨区域市场扩张往往是有效率的,有利于企业扩大市场份额,提升其市场影响力,抑制其他企业进入,进而有助于企业长期发展和产能利用率提升。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a: 分权、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更替引致的市场扩张有利于抑制产能过剩。

2. 创新与产能利用率

集权和分权对企业创新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分权能提高决策效率,促进企业创新,而集权限制了下层组织的自主权,削弱了员工的积极性,减少了组织创新效率和创新方法^[35]。对于倾向于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创新而言,创新主体需要了解市场并且灵活反应^[36]。相比于管理者,基层员工掌握更多的市场信息,将决策权下放,让拥有市场知识的基层员工与创新决策主体统一,这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途径之一^[19]。

此外,当经理对公司没有剩余索取权时,则没有激励,且基于对风险的厌恶,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回避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点的创新项目。而通过引入良好的激励机制企业能够强化对经理创新行为的监管,降低其风险厌恶程度,进而有利于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加大研发力度^[37]。管理层更替可以看作事后的惩罚激励,意味着企业经理表现不佳时所面临的降职威胁,往往具有更强的威慑作用。研究发现,管理层不具备更替风险时容易逃避创新^[38]。降职或更换管理者有助于打破传统僵化的管理结构,选拔更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管理者,从而提升管理效率和创新水平^[39]。

总之,分权通过统一信息和决策主体,增加了产品创新的渠道,而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更替能够强化对管理层投资行为的监管,提升创新效率。而创新会提升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降低成本或提升产品质量,进而促进产品需求和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同时,由激励、监管机制的引入激发的组织管理创新有助于优化生产管理流程,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b: 分权、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更替引致的企业产品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有助于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说明与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 2005 年世界银行统计的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该数据反映了 2004 年中国 30 个省份共 120 个地级城市的工业企业经营情况。样本数据以抽样和问卷调查形式获得,主要涵盖企业基本信息、供应商与政府关系、基础设施和服务、财务指标、员工结构和所有权等信息。在剔除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企业治理、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雇佣人数等相关变量缺失或异常的样本后,本文最终保留 11 221 个样本观测值。此外,本文还使用 2003 年的世界银行调查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该调查针对中国中西部、沿海 18 个城市共 2 400 家企业开展,主要反映中小企业的投资经营状况。

(二) 计量模型

为检验企业治理与产能利用率的关系,我们建立如下 OLS 模型:

$$\ln CU_{fjc} = \beta_0 + \beta_1 FirmGovern_{fjc} + \gamma X_{fjc} + \mu_i + \lambda_c + \varepsilon_{fjc} \quad (1)$$

其中 f 、 i 和 c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城市编号, $\ln CU_{fjc}$ 表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 $FirmGovern_{fjc}$ 是与企业治理相关的一组变量, X_{fjc}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μ_i 为行业固定效应, λ_c 为城市固定效应, ε_{fjc} 为误差项。鉴于相同城市或者相同行业内的企业可能出现截面相关现象,本文使用根据城市-行业群聚调整后的标准误。考虑到企业治理变量的内生性,本文另外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模型(1)。

(三) 变量设定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产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 CU)作为被解释变量,产能利用率反映了企业资源设备的利用程度,是判定产能过剩的重要标准^[27]。经验事实证明,长期产能过剩的企业,产能利用率通常不会特别高^[40]。

2. 核心解释变量

经理层处于公司内部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是公司治理能力评价的主要对象,与之相关的经理层薪酬、激励约束机制、权力分配等因素更是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李维安和张国萍^[41]从薪酬、控制权、经理任免制度及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构建经理层治理评价指标,研究发现经理层治理水平与这些指标显著相关,改善经理层治理水平能够明显促进企业管理绩效提升。此外,不同的权利配置方式会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治理效应、管理效率与组织激励,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影响^[19]。因此,本文选取 2005 年世界银行第一份问卷调查“董事会和总经理信息”中的决策分权程度、薪酬绩效激励机制及管理更替风险来衡量企业内部治理程度。具体如下:

决策分权程度(*Decentralize*)。决策权的配置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分权管理在组织激励和决策效率上更具有优势。本文将调查问卷中初级经理或员工拥有决策权的多少作为判断决策权分散程度的指标,选项数值越大说明企业基层经理和员工越能够广泛参与企业决策,即决策权分散下放至基层,反之则表明决策权集中于管理层。

薪酬绩效激励机制(*GMincome*)。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管理层薪酬激励计划在企业中普遍施行,这一做法能够有效避免经理人的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围绕问卷中询问的“经理年收入与企业绩效是否关联”构建总经理薪酬—绩效相关的虚拟变量,若总经理薪酬与绩效相关赋值为1,否则为0。

管理层更替风险(*Fire*)。在管理层中引入风险竞争机制,既能强化对管理者的监管,也是调整管理层组织结构及优化治理绩效的一种有效手段。设置管理层任免机制,有利于发现公司管理层治理中的源头问题,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绩效,促使公司管理层任免制度市场化、规范化。参考李后建和张宗益^[42]的做法,本文使用一个虚拟变量来反映管理层的更替风险,即若管理层在过去3年内遭受解雇或降职,则赋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企业产能利用率与其他许多因素有关,参照王永进等^[27]、张国胜和刘政^[43]的做法,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2002年企业产能利用率($\ln CU_{2002}$)^①、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Dustate*)、融资约束(*Finance*)、企业与主要供应商的关系(*Cooperation*)、临时工占比(*Temporary*)、资本密度($\ln KL$)、企业规模(*Size*)、全要素生产率(*TFP*)、企业年龄($\ln age$)。以上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2005年的调查数据,本文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此外,本文采用樊纲等^[44]的市场化指数来度量企业所在地市场化程度。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第(1)列至第(3)列是控制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后,反映企业治理的三个主要解释变量对产能利用率的回归结果。这三个指标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引入管理层薪酬绩效激励、管理层更替以及分权决策等治理方式能显著

表1 变量的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ln CU_{2004}$	2004年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自然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	<i>Decentralize</i>	决策分权程度,数值1~5表示员工拥有的决策权递增,数值越大说明决策权越分散
	<i>GMincome</i>	虚拟变量,若总经理薪酬与企业绩效相关赋值为1,否则为0
	<i>Fire</i>	虚拟变量,若管理层在过去3年内被解雇或降职赋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ln CU_{2002}$	2002年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自然对数
	<i>Dustate</i>	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当企业的国有股份超过50%时取1,否则取0
	<i>Finance</i>	宏观政策调整时,企业获得贷款难易程度的评价,数值1~5表示越来越容易
	<i>Cooperation</i>	企业与主要供应商的关系,通过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合作时间的长短来反映,数值1~7表示合作时间越来越长
	<i>Temporary</i>	临时工占总雇员的比重
	$\ln KL$	企业资本密度,用人均资本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i>Size</i>	企业规模,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单位:十亿元)来衡量
	<i>TFP</i>	全要素生产率,参考Giannetti et al. ^[45] 的研究,利用索洛余值法估计得到
	$\ln age$	企业年龄的自然对数
	<i>Market</i>	市场化程度总指数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CU_{2004}$	11 221	-0.206	0.257	-1.715	0.000
<i>GMincome</i>	11 221	0.671	0.470	0.000	1.000
<i>Fire</i>	11 221	0.460	0.498	0.000	1.000
<i>Decentralize</i>	11 221	2.483	0.975	1.000	5.000
$\ln CU_{2002}$	11 221	-0.303	0.391	-6.908	0.000
<i>Dustate</i>	11 221	0.129	0.335	0.000	1.000
<i>Finance</i>	11 221	2.953	1.173	1.000	5.000
<i>Cooperation</i>	11 221	4.953	1.522	1.000	7.000
<i>Temporary</i>	11 221	0.218	0.286	0.000	1.000
$\ln KL$	11 221	3.868	1.398	-5.165	15.566
<i>Size</i>	11 221	0.505	2.552	0.001	100.907
<i>TFP</i>	11 221	2.858	1.164	-5.653	10.028
$\ln age$	11 221	2.282	0.791	1.099	7.602
$\ln Expansion$	11 221	-2.718	3.443	-9.210	0.000
$\ln Innovation$	11 221	3.669	3.634	0.000	15.288
$\ln pmc$	11 221	5.269	1.181	-0.300	14.295
<i>Market</i>	11 221	6.844	1.676	1.550	9.810

抑制企业产能过剩。鉴于市场化程度变量与城市固定效应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第(1)列至第(3)列的回归中未加入市场化程度变量。在第(4)列至第(6)列中加入市场化程度控制变量,但未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其结果依然显著为正。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引入管理层薪酬绩效激励、管理层更替及分权决策均有助于该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其中,*GMincome*的回归系数为0.024,这意味着相较于管理层薪酬不与绩效挂钩的企业,引入管理层薪酬激励的企业产能利用率平均高出2.4%;*Fire*的回归系数为0.013,这说明相较于没有管理层被解雇或降职的企业(过去3年内),有管理层被解雇或降职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平均高出1.3%;*Decentralize*的回归系数为0.007,说明企业决策分权程度每上升一个层次(决策分权程度为分类变量,赋值1~5),产能利用率将平均提高0.7%。上述结果不仅在统计上显著,而且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在控制变量方面: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系数显著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说明企业技术进步有助于避免产能浪费;与供应商的合作关系(*Cooperation*)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王永进等^[27]的结果一致;是否为国有企业虚拟变量(*Dustate*)的系数为负,说明国有企业相比追求利润的私企更易出现产能过剩,符合预期;企业融资约束(*Finan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融资能力越强,企业抵抗和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越大,越有利于规避产能过剩;人力资本是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临时雇员占劳动力的比例(*Temporary*)越大,意味着企业的劳动力技能水平越低,对产能有不利影响。滞后两年的产能利用率、企业规模、人均资本量及市场化程度均与企业产能利用率正相关。

(二) 工具变量检验

一方面,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后,经济效益增长可能会促使企业更有能力完善治理水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企业层面某些不可观测因素的遗漏,也会导致内生性偏误。在控制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Fisman and Svensson^[46]的方法用薪酬绩效激励(*GMincome*)、管理层更替风险(*Fire*)和决策分权程度(*Decentralize*)的城市-行业平均值作为对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这一变量代表了城市-行业层面的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治理能力与外部大环境息息相关,即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但单个企业的治理水平不大可能反过来对城市-行业层面公司治理水平造成影响,即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表3 企业治理与产能利用率的 OLS 回归结果

	lnCU ₂₀₀₄					
	(1)	(2)	(3)	(4)	(5)	(6)
<i>GMincome</i>	0.024 *** (0.004)			0.024 *** (0.004)		
<i>Fire</i>		0.013 *** (0.004)			0.015 *** (0.004)	
<i>Decentralize</i>			0.007 *** (0.002)			0.007 *** (0.002)
lnCU ₂₀₀₂	0.370 *** (0.017)	0.371 *** (0.017)	0.371 *** (0.017)	0.375 *** (0.017)	0.376 *** (0.017)	0.377 *** (0.017)
<i>Dustate</i>	-0.008 (0.007)	-0.009 (0.007)	-0.007 (0.007)	-0.013* (0.007)	-0.013* (0.007)	-0.012 (0.007)
<i>Finance</i>	0.013 *** (0.002)	0.014 *** (0.002)	0.014 *** (0.002)	0.013 *** (0.002)	0.014 *** (0.002)	0.014 *** (0.002)
<i>Cooperation</i>	-0.003 ** (0.001)	-0.003 ** (0.001)	-0.003 ** (0.001)	-0.003 ** (0.001)	-0.003 ** (0.001)	-0.003 ** (0.001)
<i>Temporary</i>	-0.013* (0.007)	-0.013* (0.007)	-0.014* (0.007)	-0.013* (0.007)	-0.012* (0.007)	-0.014* (0.007)
lnKL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i>Size</i>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i>TFP</i>	0.022 *** (0.002)	0.023 *** (0.002)	0.023 *** (0.002)	0.021 *** (0.002)	0.022 *** (0.002)	0.022 *** (0.002)
lnage	-0.011 *** (0.003)	-0.011 *** (0.003)	-0.011 *** (0.003)	-0.012 *** (0.003)	-0.013 *** (0.003)	-0.012 *** (0.003)
<i>Market</i>				0.003* (0.001)	0.003 ** (0.001)	0.003* (0.001)
_cons	-0.172 *** (0.016)	-0.164 *** (0.015)	-0.177 *** (0.016)	-0.183 *** (0.017)	-0.175 *** (0.017)	-0.188 *** (0.018)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No	No	No
N	11 221	11 221	11 221	11 221	11 221	11 221
R ²	0.391	0.390	0.390	0.378	0.377	0.37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城市-行业群聚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表4 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三个主要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显著正相关。弱IV检验结果显示,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超过10%扭曲下对应的临界值^②,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方括号内报告的P值为0.000,通过了工具变量可识别检验。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薪酬绩效激励(*GMincome*)、管理层更替风险(*Fire*)和决策分权程度(*Decentralize*)的系数仍在5%~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治理水平的改善对产能利用率确实有正向作用。虽然部分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略有下降,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仍保持一致。

由于工具变量是行业-地区的平均值,存在行业-地区组合只有一个样本的极端情况,为排除工具变量的内生性,本文参照李春涛和宋敏^[48]的方法,剔除样本数小于4的城市-行业组合,最终得到10 565个样本重新进行检验。估计结果与表4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未展示),其中第一阶段回归中三个主要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的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二阶段*GMincome*和*Decentralize*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Fire*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三)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

1. 剔除特定城市。考虑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特殊的行政地位及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为了证实这类城市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剔除四大直辖市、省会城市后得到8 433个样本,回归结果见表5。如表5所示,删除特定城市观测值后,反映企业治理程度的三个指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薪酬绩效激励(*GMincome*)、管理层更替风险(*Fire*)和决策分权程度(*Decentralize*)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2. 更换样本。考虑到单一样本可能存在一定的

表4 企业治理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i>GMincome</i>	<i>Fire</i>	<i>Decentralize</i>	$\ln CU_{2004}$	$\ln CU_{2004}$	$\ln CU_{2004}$
	(1)	(2)	(3)	(4)	(5)	(6)
<i>IV_GMincome</i>	0.990 *** (0.003)					
<i>IV_Fire</i>		0.943 *** (0.006)				
<i>IV_Decentralize</i>			0.993 *** (0.002)			
<i>GMincome</i>				0.028 ** (0.012)		
<i>Fire</i>					0.024 * (0.012)	
<i>Decentralize</i>						0.013 ** (0.006)
_cons	-0.133 *** (0.026)	-0.169 *** (0.028)	-0.022 (0.05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No	No	No
N	11 221	11 221	11 221	11 221	11 221	11 221
R ²	0.178	0.201	0.161	0.345	0.344	0.344
弱IV检验	1 570.91 <16.38 >	1 463.72 <16.38 >	1 516.45 <16.38 >			
IV可识别检验	487.75 [0.000]	568.43 [0.000]	506.69 [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根据城市-行业群聚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方括号内为P值;控制变量回归结果与表3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故未列出,下文表格与此相同,不再重复说明。

表5 剔除特定城市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ln CU_{2004}$		
	(1)	(2)	(3)
<i>GMincome</i>	0.025 *** (0.005)		
<i>Fire</i>		0.015 *** (0.005)	
<i>Decentralize</i>			0.008 *** (0.002)
_cons	-0.159 *** (0.017)	-0.151 *** (0.017)	-0.167 *** (0.01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N	8 433	8 433	8 433
R ²	0.389	0.388	0.388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城市-行业群聚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偶然性,本文另外使用2003年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估计,该数据反映了被调查企业2002年的基本情况。本文选取该样本中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自然对数($\ln CU_{2002}$)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分别为总经理是否有激励计划将收入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的虚拟变量($GMincome$)、公司管理层是否因董事会决议被解聘的虚拟变量($Fire$)、董事会是否有员工代表作为分权的代理指标($Decentralize$)。另外,本文将人均资本生产率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代理控制变量,其他参照前文选取对应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三个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之前基本保持一致。因此,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基准结果是稳健的。

3. 更换估计所用标准误。考虑到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回归拟合时所使用的样本变差来自企业层面,本文使用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进行估计,发现基准回归中各系数值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另外,本文分别使用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的标准误,回归结果也同样稳健。限于篇幅,结果未予展示。

(四) 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研究管理层薪酬激励、管理层更替风险和决策分权等企业治理模式影响产能利用率的具体机制,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ln Innovation_{fic} = \beta_0 + \beta_1 FirmGovern_{fic} + \gamma X_{fic} + \mu_i + \lambda_c + \varepsilon_{fic} \quad (2)$$

$$\ln Expansion_{fic} = \beta_0 + \beta_1 FirmGovern_{fic} + \gamma X_{fic} + \mu_i + \lambda_c + \varepsilon_{fic} \quad (3)$$

其中, $FirmGovern_{fic}$ 是一组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变量; $\ln Innovation_{fic}$ 为企业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用来度量企业创新水平; $\ln Expansion_{fic}$ 为企业在“国内省外”销售产品占比的自然对数,本文参考张国胜和刘政^[43]的做法,将其作为企业外部市场扩张程度的代理变量;其他变量与模型(1)一致。

表7第(1)列结果显示,管理层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适当的薪酬激励有助于缓解企业委托-代理的利益矛盾问题,而研发创新是企业经理人获得长期高收益的投资选择^[49]。第(2)列结果表明,管理层面临更替风险的企业更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这说明面临更替风险会较大幅度地诱导管理者做出创新行为。李春涛和宋敏^[48]发现企业的激励机制对研发参与度、研发投资密度以及创新产出都具有正向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结论。

第(3)列结果显示,分权决策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行为,这说明将权力下放至各部门,能为下级部门提供权力激励,可以激发各级员工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现有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活动能够显著提

表6 基于2003年世界银行数据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ln CU_{2002}$		
	(1)	(2)	(3)
$GMincome$	0.067 *** (0.024)		
$Fire$		0.050 ** (0.024)	
$Decentralize$			0.055 ** (0.025)
$_{cons}$	-0.482 *** (0.099)	-0.479 *** (0.098)	-0.475 *** (0.09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N	1 328	1 328	1 328
R ²	0.493	0.491	0.492

注: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城市-行业群聚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表7 市场化治理影响产能利用率的机制检验结果

	$\ln Innovation$			$\ln Expansion$		
	(1)	(2)	(3)	(4)	(5)	(6)
$GMincome$	0.938 *** (0.067)			0.455 *** (0.069)		
$Fire$		1.297 *** (0.064)			0.678 *** (0.062)	
$Decentralize$			0.146 *** (0.030)			0.101 *** (0.032)
$_{cons}$	-0.929 *** (0.213)	-0.762 *** (0.206)	-0.822 *** (0.225)	0.277 *** (0.024)	0.288 *** (0.024)	0.294 *** (0.0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1 221	11 221	11 221	11 221	11 221	11 221
R ²	0.292	0.307	0.280	0.199	0.204	0.196

注: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城市-行业群聚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尤其是研发支出、产品创新对化解产能过剩具有突出的积极作用^[32]。

表7第(4)列至第(6)列回归结果显示,企业治理与省际扩张程度均显著正相关,即企业治理机制的引入,增加了企业产品在省外的销售占比。这说明分权、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更替等治理机制的引入有利于企业跨省贸易和扩大市场规模。研究发现企业的省际市场扩张引致的市场竞争加剧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渠道之一^[44]。因此,市场扩张是企业治理变量影响产能过剩的作用渠道之一。

五、进一步分析

(一) 企业所有权与产能利用率

在不同所有权性质下,企业的管理效率和产能利用水平可能存在差异。国有企业以行政型治理为特征,本身存在扩张产能的激励,更容易出现不计成本的过度投资和“恶性竞争”行为^[1]。而非国有企业以市场信号为目标,受利润最大化驱动,在产能决策上更加理性谨慎。

因此,本文实证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市场化治理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产能过剩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分组中更显著,而在国有企业分组中较不显著。*GMincome*和*Decentralize*的组间系数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Fire*的组间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由于国有企业层级化管理严重、存在政府干预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市场化治理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政府管制会激励国有企业致力于非市场策略而分散企业创新精力,弱化创新的去产能效应^[32],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市场化治理能够有效实施,促使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至创新活动中。

(二) 政企关系与产能利用率

我国政府部门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和信息优势,对经济活动和企业经营拥有强大的干预能力。企业与税务、公安、环境及劳动保障等职能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有益于其稳定经营和获取更为充分的市场信息。张龙鹏和蒋为^[14]发现,当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时,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够帮助企业规避政府的不当干预,有助于其获取信息资源。因此,当市场机制不完善时,政企关系能有效替代正式的制度环境,调节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制约政府的不当干预行为。

2005年世界银行调查了政企关系情况,将企业与税务、公安、环保等部门的关系程度划分为5个等级:不良、一般、中等、良好和很好。基于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政企关系较好(包含良好、很好)和政企关系普通(包含不良、一般和中等)两个组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当政企关系普通时,企业治理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更强,这意味着企业内部治理的完善弱化了企业对政府资源的依赖,使企业能够自主获取需要的市场信息和资源,其受政府的影响被削弱。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引入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避免政府不当干预带来的生产效率损失。

(三) 地区市场化与产能利用率

从理论上来看,市场化环境会优化企业的激励机制,使企业在调整资金、劳动力等资源应对市场和技术冲击时具有更多的优势^[31]。本文采用樊纲等^[44]发布的“各省份市场化进程得分”来评估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将所有企业按地区市场化指数分为高、中、低3组,讨论在不同市场化水平地区,

表8 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回归结果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1)	(2)	(3)	(4)	(5)	(6)
<i>GMincome</i>	0.034 ** (0.016)			0.022 *** (0.005)		
<i>Fire</i>		0.014 (0.013)			0.011 *** (0.004)	
<i>Decentralize</i>			0.000 (0.006)			0.008 *** (0.002)
系数差异检验 (P值)				0.000	0.019	0.000
<i>_cons</i>	-0.313 *** (0.087)	-0.310 *** (0.088)	-0.306 *** (0.087)	-0.165 *** (0.016)	-0.157 *** (0.016)	-0.173 *** (0.0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467	1 467	1 467	9 749	9 749	9 749
R ²	0.502	0.501	0.500	0.379	0.378	0.379

注: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城市-行业群聚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企业治理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如表 10 所示,企业治理变量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分组中都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中、低的分组中,薪酬绩效激励和管理层更替的系数均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P 值结果显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治理化解产能过剩的效应更突出。

这一结果说明,企业治理对外部市场制度的监管功能具有替代效应。市场化水平较薄弱的地区,出现政企合谋、滥用公权、寻租等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更大。当外部环境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时,企业治理的引入有利于弥补这一缺陷。因此,企业治理在不同市场化水平地区呈现不同效果,企

业产能过剩的治理效应在低市场化程度地区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言,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企业治理对产能过剩的边际影响被大大削弱。

表 9 政企关系异质性回归结果

	税务部门与企业关系较好			税务部门与企业关系普通		
	(1)	(2)	(3)	(4)	(5)	(6)
<i>GMincome</i>	0.018*			0.024***		
	(0.009)			(0.005)		
<i>Fire</i>		0.016*			0.012***	
		(0.009)			(0.005)	
<i>Decentralize</i>			0.001			0.007***
			(0.004)			(0.002)
系数差异检验 (P 值)				0.003	0.033	0.000
<i>_cons</i>	-0.140***	-0.138***	-0.135***	-0.176***	-0.166***	-0.181***
	(0.030)	(0.030)	(0.031)	(0.018)	(0.017)	(0.01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 040	2 040	2 040	9 180	9 180	9 180
R^2	0.446	0.446	0.445	0.389	0.388	0.388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城市-行业群聚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公安、环境、劳动保障部门与企业关系异质性分组回归结果与表 9 中的税务部门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未列出。

表 10 地区市场化程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市场化程度高			市场化程度中			市场化程度低		
	(1)	(2)	(3)	(4)	(5)	(6)	(7)	(8)	(9)
<i>GMincome</i>	0.009			0.030***			0.033***		
	(0.007)			(0.007)			(0.009)		
<i>Fire</i>		0.004			0.016**			0.017**	
		(0.006)			(0.007)			(0.008)	
<i>Decentralize</i>			0.002			0.002			0.015***
			(0.003)			(0.003)			(0.004)
系数差异检验 (P 值)				0.000	0.013	0.330	0.000	0.035	0.000
<i>_cons</i>	-0.138***	-0.134***	-0.140***	-0.185***	-0.175***	-0.176***	-0.178***	-0.167***	-0.198***
	(0.022)	(0.022)	(0.023)	(0.025)	(0.024)	(0.025)	(0.031)	(0.030)	(0.03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 352	3 352	3 352	3 979	3 979	3 979	3 888	3 888	3 888
R^2	0.393	0.392	0.392	0.400	0.398	0.398	0.373	0.371	0.37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根据城市-行业群聚调整的稳健性标准误。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能过剩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资源错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急需克服的重大问题。有关产能过剩的原因和治理,现有文献多从政府管制、地方政府竞争扭曲以及国企软预算约束等宏观视角出发进行研究,而忽视了市场化机制的作用。在政策实践中,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正逐渐成为近年来产能调控政策的一个新特征。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更是明确强调,要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化解过剩产能长效机制。虽然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关于市场化机制是如何影响

产能过剩的系统研究,而且鲜有文献深入考察企业治理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与现有研究从宏观和行业视角探究产能过剩治理不同,本文从企业这一微观的市场化机制视角考察企业治理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分权、管理层薪酬激励及管理层更替等治理机制影响企业投资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机制,即良好的企业治理架构能够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投资和决策效率,进而通过减少投资失误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缓解产能过剩。其次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说。渠道检验表明,企业治理通过增加创新和促进市场扩张抑制产能过剩。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政企关系较弱的企业,企业治理机制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显著;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企业治理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越突出。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权力配置,完善激励机制。企业应摒弃行政性的制度约束,建立管理层选拔聘用和考核制度,将管理者能力和绩效表现作为选用人才的关键指标。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适当将决策权下放,鼓励基层员工积极参与生产投资决策。

第二,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推动企业治理理念由行政式向经济式转变。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减少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不当干预。加快对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优化重组,鼓励企业兼并和重组,允许企业扩大规模和开展省际的跨地区经营行为,提升行业市场集中度。

第三,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现代化治理模式,加快应用信息化通信技术,丰富组织内各层级间的沟通方式,缓解信息不对称。及时更新应用5G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设备,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非效率损耗,降低管理成本。监管管理者投资行为,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根据市场情况进行有效的产品研发和管理流程创新,鼓励员工自主创新。

第四,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区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更多运用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区域间要素流动、保障市场交易公平公开”为主,通过平等保护产权以及平等取得生产要素、贷款、土地,促进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形成一个在法治约束下主要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

注释:

- ①由于企业家能力更强的企业可能拥有更高的企业治理水平,这类企业产能利用率也可能更高。因此本文通过控制滞后期的产能利用率水平替代企业固定效应以吸收不可观测的企业家才能、偏好等因素,这样可以较好地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 ②根据 Stock and Yogo^[47]的研究,容忍10%扭曲下对应的临界值为16.38。

参考文献:

- [1]江飞涛,耿强,吕大国,等.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44-56.
- [2]徐朝阳,周念利.市场结构内生变迁与产能过剩治理[J].经济研究,2015(2):75-87.
- [3]吴利学,刘诚.项目匹配与中国产能过剩[J].经济研究,2018(10):67-81.
- [4]范林凯,李晓萍,应珊珊.渐进式改革背景下产能过剩的现实基础与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5(1):19-31.
- [5]杨其静,吴海军.产能过剩、中央管制与地方政府反应[J].世界经济,2016(11):126-146.
- [6]张维迎,马捷.恶性竞争的产权基础[J].经济研究,1999(6):11-20.
- [7]干春晖,邹俊,王健.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J].中国工业经济,2015(3):44-56.
- [8]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33-40.
- [9]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J].管理世界,2014(10):17-36+46.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1]李维安,姜涛.公司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财贸经济,2007(12):56-61+141.
- [12]鲁桐,党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分行业比较[J].经济研究,2014(6):115-128.
- [13]宣烨.要素价格扭曲、制造业产能过剩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J].经济学动态,2019(3):91-104.
- [14]张龙鹏,蒋为.政企关系是否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J].产业经济研究,2015(6):82-90.
- [15]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10):4-19.
- [16]白让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国有中小企业退出与“去产能”问题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6(7):65-74.
- [17]COLOMBO M G, DELMASTRO M.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 empirical test [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4, 52(1): 53-80.
- [18]SCHUSTER C P, DUFEK D F. The consumer... or else!: consumer-centric business paradigm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 [19]谭洪涛,陈瑶.集团内部权力配置与企业创新——基于权力细分的对比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9(12):134-151.
- [20]RADNER R. The organization of decentraliz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 Econometrica, 1993, 61(5): 1109-1146.
- [21]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3):32-39+64-80.
- [22]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4): 305-360.
- [23]KATO T, MORISHIMA M. Th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participatory employment practices: evidence from new Japanese panel data [J]. 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 2002, 41(4): 487-520.
- [24]GUADALUPE M, WULF J. The flattening firm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the effe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corporate hierarchies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0, 2(4): 105-127.
- [25]姜付秀,伊志宏,苏飞,等.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管理世界,2009(1):130-139.
- [26]CHRISTIE A A, JOYE M P, WATTS R L.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firm: theory and evidence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3, 9(1): 3-36.
- [27]王永进,匡霞,邵文波.信息化、企业柔性 with 产能利用率[J].世界经济,2017(1):67-90.
- [28]刘航,孙早.城镇化动因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4(11):5-17.
- [29]周其仁.信息成本与制度变革——读《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J].经济研究,2005(12):119-124.
- [30]江飞涛,曹建海.市场失灵还是体制扭曲——重复建设形成机理研究中的争论、缺陷与新进展[J].中国工业经济,2009(1):53-64.
- [31]何小钢,梁权熙,王善骞.信息技术、劳动力结构与企业生产率——破解“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之谜[J].管理世界,2019(9):65-80.
- [32]李后建,张剑.企业创新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机制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17(2):114-126.
- [33]PENROSE E, PENROS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4]CHANDLER A D.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2.
- [35]AGHION P, TIROLE J. 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7, 105(1): 1-29.
- [36]孙早,许薛璐.前沿技术差距与科学研究的创新效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谁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J].中国工业经济,2017(3):5-23.
- [37]COLES J L, DANIEL N D, NAVEEN L.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risk-taking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2): 431-468.
- [38]BERTRAND M, MULLAINATHAN S. Enjoying the quiet lif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preferenc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1(5): 1043-1075.
- [39]HART O, HOLMSTROM B. The theory of contracts [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1986.

- [40]钟春平,潘黎.“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J].经济动态,2014(3):35-47.
- [41]李维安,张国萍.经理层治理评价指数与相关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5(11):87-98.
- [42]李后建,张宗益.地方官员任期、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J].科学学研究,2014(5):744-757.
- [43]张国胜,刘政.属地经营、省际市场扩张与产能过剩治理[J].财贸经济,2016(12):116-132.
- [44]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9):4-16.
- [45]GIANNETTI M, LIAO G M, YU X Y. The brain gain of corporate boards: evidence from China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4): 1629-1682.
- [46]FISMAN R, SVENSSON J.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1): 63-75.
- [47]STOCK J H, YOGO M.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 [R]. NBER technical working paper 0284, 2002.
- [48]李春涛,宋敏.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所有制和CEO激励的作用[J].经济研究,2010(5):55-67.
- [49]TOSI H L, WERNER S, KATZ J P et al. How much does performance matter? A meta-analysis of CEO pay studi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0, 26(2): 301-339.

(责任编辑:李敏)

Can market mechanism alleviate overcapacity?

From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HE Xiaogang¹, CHEN Jinling¹, LUO qi², WANG Zili¹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Market reform provides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resolve excess capacity. This article explores a new market-based mechanism to solve over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a well-designed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invest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nd effectively alleviate overcapacity by reducing investment errors and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Further, this paper uses survey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of 11 211 enterprises in 120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of China,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capacity utilization and verify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nds that: (1) The market-oriented governance mechanisms such as decentralization, salary incentive and management turnover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alleviate endogeneity and eliminating a series of factors that may interfere with the estimation results. (2)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capacity utilization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wo methods of promoting market expansion and increasing innovation. (3)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with weak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s, and low-market-oriented areas,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resolving overcapacity is more prominent. The research in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strengthen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overcapacit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policy inspiration for China to further promote market reform and high-quality growth.

Key words: market-oriented mechanism; corporate governance; capacity utilization; de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high-quality growth